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2年4月17日 (第258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专家：美国应增加国防开支以匹配其外交战略

战略与现实相一致应该是国防规划过程自始至终的重点。美国需要扩大美军规模，才能与华盛顿现有的外交主张相匹配。虽然防务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但增加国防开支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险政策，因为它能确保美国具有保护自己、盟友和国家利益的能力。

中美关系

美学者：美国在关注俄乌冲突的同时应兼顾对华竞争

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杂志网站 4 月 6 日登载了华盛顿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研究员玛丽·布鲁克斯(Mary Brooks) 的文章称，美国当下虽面临中俄两个对手，但只要组织得当，美国有能力同时应对两项挑战。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将美中关系的基调定性为“战略竞争”。该战略侧重于三个支柱：一是通过强调公平、种族平等、气候可持续性和民主来争取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二是重振美国经济实力；三是通过打击知识产权盗窃行为阻止中国获得关键技术对其进行防御。美国希望在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技术等领域取得对华全面胜利。然而，俄乌冲突的爆发分散了美国的资源、时间和注意力，这意味着美国的对华战略需要转型。只要组织得当，美国有能力同时应对上述两项挑战。

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将掌握定义和控制国际秩序的权力，因此，美国开展对华竞争需要一个完善健全的国家技术安全战略。这有助于国家率先察觉弱点，形成一个允许公私部门不断进行自我革新，不受国内政治危机影响的体系。明确的技术战略有助于美国在应对外部威胁时还能保持在正轨上，帮助美国政府做出基于风险的长期决策，协调私营部门。具体而言，技术战略能助美国制定创新议程，而非针对单一竞争对手来调整方向，充分发挥美国的商业和创新优势。从结构上看，技术战略应侧重于在问题演变为危机之前识别问题。虽然该策略的细节仍有待讨论，但一些基本内容已经可以在《美国竞争法》中找到。

《外交家》：美国联合盟友对华实施二级制裁困难重重

近日，美国《外交家》(The Diplomat) 杂志网站登载了英国工业联合会(CBI) 政策分析师约瑟夫·卡什(Joseph Cash) 的文章称，拜登政府欲以中国“破坏”对俄制裁为由，联合盟友对华施加二级制裁的目标恐难以实现。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政府日前已向中国明确表示，若其行为干扰美国的对俄制裁，将面临相应的后果，此类后果主要指极具争议性的二级制裁。二级制裁的底层逻辑基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切断外国实体或个人进入美国消费和金融市场为主要手段，威慑中立国家，使其断绝与受制裁国家的经济关系。与初级制裁（指禁止制裁国本国的实体和个人与被制裁国的同行接触）不同，二级制裁具有治外法权，以第三国采取中立立场为前提，通常被视为美国的越权行为。

虽然二级制裁在过去十年中变得愈发常见，但美国若想联合七国集团共同惩罚中国保持“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合作”却十分困难。欧盟和英国等关键盟友不具有对中国实体实施二级制裁的监管框架。并且，事实上，欧盟和中国一样，不承认美国制裁的治外法权影响，也不太可能按照拜登政府的要求放弃这一立场。

想让盟友与美国一道要求中国向俄罗斯施压，就要对华实施类似于对白俄罗斯施加的制裁。然而此举不太可能实现，原因主要有三：首先，缺乏充足理由就制裁中国，可能会导致二级制裁的滥用。其次，如果不能无可辩驳地解释“为什么是中国，而非其他中立国家受到制裁”，制裁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可信度将严重受损，还可能面临与其他中立国关系恶化的风险。最后，各国立法者希望对切断与中国的商业联系进行长期和认真的考虑。

综上所述，美国较难联合盟友对华实施二级制裁。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中国如何看待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知之甚少，还因

为这有可能疏远其他第三方市场。更重要的是，七国集团不愿在全球治理中失去可信度，开创随意使用制裁的先例，为中国提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不符合全球利益的证据。

美专家：美国应优化移民政策以开展对华科技竞争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4 月 10 日登载林肯网络(Lincoln Network) 智库政策主管卢克·霍格 (Luke Hogg) 的文章称，针对全球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才吸纳是中美争夺技术主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积极推动相关立法确保其获得竞争优势。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在对华竞争中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吸引顶尖人才。但近来，中国日益成为美国人才吸纳方面的竞争对手。中国主要通过两种手段吸引人才，一是激励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公民回国工作；二是放宽包括 STEM 领域在内的工作签证。这些人才正帮助中国迅速成为在包括人工智能创新等新兴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如果美国要在技术和工程领域保持全球竞争力，更新移民系统以满足关键行业的需求应是首要任务。

就美国国会而言，应该通过立法放松人才移民限制。目前美国相关移民法规定，每年的就业人才移民 (EB) 签证被限制在 14 万个。对于许多 STEM 密集型行业而言，将顶尖人才排除在移民上限之外可能是一种急需的刺激措施。对此，众议院版《美国竞争法案》(COMPETES Act) 的第 80303 条款有两种方式实现上述目标：一是取消人才移民法定限额，任何在 STEM 领域获得博士学位者、任何获硕士学位并在关键行业工作的人，及其子女配偶都将被给予工作签证和绿卡；二是任何被录取到涉 STEM 领域研究项目、经过身份核实的学生都将获得美国签证。

除放宽移民许可的立法外，美国还需提升联邦政府管理移民和入籍福利的方式。目前，第 80303 条款生效的最大障碍是绿卡申请的积压问题。对此，提高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等联邦机构的技术能力和素养，正确构建和实施移民和入籍流程的数字系统应该成为决策者的优先事项。这不仅能减少积压，使移民受益，还能节省大量的成本。

里根政府时期管道危机对当今中美关系的启示

美国 War on Rocks 网站 4 月 5 日登载了海军军官尼古拉斯·罗曼诺（Nicholas Romanow）等人的文章称，里根政府时期的西伯利亚油气管道事件，能够给美国在中美竞争时如何管理联盟关系带来启发。文章摘要如下：

恢复盟友间关系是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能够成功动员盟友与之采取共同行动。尽管目前美国与欧洲盟友就制裁俄罗斯和支持乌克兰等相关事宜达成了一致，但若未来中美之间发生安全危机，美国不应指望其欧洲乃至亚洲的盟友和伙伴能快速加入。对此，美国应多借鉴冷战时期的历史经验。

20 世纪 80 年代，欧洲为摆脱对中东化石燃料的极度依赖，将目光投向了拥有巨大油气储备的苏联。1980 年，西德总理启动了与苏联修建油气管道的谈判，英国等欧洲国家也希望参与建设以缓解高失业率。但里根政府担心这会使苏联掌握更多的资金和西方先进技术，获得更大影响力，因此华盛顿禁止在管道项目中使用美国技术。禁令实施数月，英法德依然拒绝放弃管道项目，里根总统进一步升级了域外和追溯性制裁。愤怒的欧洲盟国最终允许本土公司无视美国的制裁，继续履行管道合同。

当僵持不下，联盟面临巨大压力时，接手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说服里根撤销制裁，开始与盟国就出口管制和全球贸易进行战略磋商。舒尔茨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专注于让北约盟国支持更重要的反苏联任务，即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此外，里根政府还找到了一个既能压制苏联石油收入，又能使盟国受益的方法——1985 年沙特阿拉伯在白宫的呼吁下大幅增加了石油产量，降低了全球油价。

里根政府在管道危机中的目标与如今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目标相似，都旨在防止其他国家受到对手国经济控制，阻止对手获得影响力。但两届政府都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遇到了困难，美国和欧洲使用了不同的方式来管理与地缘政治对手的经济关系。拜登政府在与欧洲盟友展开对话时，可以借鉴油气管道事件的经验。好的联盟管理不仅要考虑盟国的威胁感知，还要考虑其经济需求和脆弱性。美国应花时间与盟国在强有力的措施上形成外交共识，而不是草率地向它们施与制裁。

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中国的经济依存度更高。因此，美国在寻求与这些国家实现安全合作时要控制来自中国的经济影响十分困难。但近期美国在亚洲地区采取的一些政策证实了里根和舒尔茨的经验依然适用。例如，特朗普政府的“清洁网络”倡议，以及美国禁止向中国公司出售必要的半导体生产技术和设备等。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都找到了既不过度损害盟友经济，又可以限制中国进入高价值市场和获取新兴技术的创造性方法。

简言之，拜登应继续听取欧洲关切，寻找能够深化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领域。同时，美国也应尽力获得欧洲公众和领导人的支持，与它们一道限制技术外溢，提高中国的发展成本。

美国外交

布鲁金斯：美国人针对俄乌问题存在立场差异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网站 4 月 1 日登载该学会治理研究项目主席兼高级研究员威廉·加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的文章称，美国对乌克兰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呈现一个明显的悖论。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方面，美国人希望拜登总统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据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赞成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向乌克兰提供财政援助，以及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并且，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支持派遣更多的美国军队来加强北约盟国的防御。此类强硬还体现在外交层面，美国人拒绝采取能够安抚俄罗斯的相关举措。例如，仅有 20%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向俄罗斯保证乌克兰永远不会加入北约，14% 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在东欧的军事部署，同时，也只有 8% 的人认为应该允许俄罗斯对现已独立的前苏联国家施加更多权力。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人民对具体政策的看法又与政府的立场完全吻合，他们不希望政府采取已明确拒绝的、可能与俄罗斯爆发直接对抗的额外措施。据调查，仅有 33% 的美国人支持派遣美军“帮助”乌克兰，也仅有 16% 的人希望美国军队与乌克兰军队并肩作战。同时，多数美国人反对在乌克兰领空设立禁飞区，对诸如向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等非军事措施持怀疑态度，并拒绝煽动针对普京的政变。此外，俄乌冲突也改变了美国人对国际格局的理解。受访者中，58% 的人将俄罗斯视为敌人，而敌视中国的有 37%；44% 的人将俄罗斯视为直接威胁，对中国这一

数字为 33%。并且，60%的美国人认为世界存在新冷战的可能性，超过 50%的人认为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较高。

普京的决定成功地团结了两极分化的美国人。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显示，仅有 6%的美国人相信俄罗斯总统会在国际事务中做正确的事。目前对拜登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否将两党对俄罗斯的反感转变为一种新的国际立场，并借此获得总统在冷战期间可以依赖的跨党派支持。

美专家：美国应采取相关措施打击虚假信息

美国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 (Modern War Institute) 网站近日登载美国网络国家部队政策与战略司司长劳拉·基南 (Laura Keenan) 的文章称，虚假信息问题会侵蚀国家集体意志，需要被及时抑制。文章摘要如下：

传播虚假信息是一种非对称战略，易于实施、成本低、传播性强且难以归类。同时，围绕信息的冲突完全低于武装冲突的门槛，因此，不太可能发生任何军事升级。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拥有众多受众的社交媒体影响者 (influencer) 逐渐成为了国家传播虚假消息的重要媒介。例如：俄罗斯试图招揽有影响力的人传播有关疫苗的分裂性内容，或者通过“网红账号”分享俄罗斯历史、文化、现代生活和外交内容，以塑造人们的看法。

此外，有效的信息营销活动通常需要与众多数字节点相结合。因此，在信息运营领域，“攻击者”通过穿“马甲” (sock puppets) 创建多个虚假账户以增加曝光率。这些虚假信息播种混乱、恐惧、不安和分裂，除非国家能够采取更强有力的缓解措施，否则对抗虚假信息就像是一场低烧，会侵蚀国家集体意志。基于此，文章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美国应采取“接种理论”（inoculation theory）策略。“接种理论”是一种通过让人们提前接触反对其信仰的论点，并给予他们反驳攻击的方式，来助其抵抗虚假信息模式。研究发现，该策略让个人接触有关信息的警告，使得他们有能力去辨别真相。美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就采取了这一策略，通过领先于俄罗斯发布相关信息来塑造和控制舆论。

第二，向公众传授反虚假信息的相关知识。在欧盟，针对虚假信息的预防措施已经被广泛采用。芬兰通过媒体扫盲向民众传授反虚假信息知识；荷兰进行虚假信息教育；瑞典成立了心理防御机构，其任务是识别和打击信息影响。美国在评估政策方法时可参考欧盟的做法。

第三，允许更大的信息透明度。在主要平台的资助下，允许更大信息透明度，以帮助民众区分虚假和真实的信息。对此，社交媒体网站应承担更多责任，政府也应加强网络安全监管。

前中情局官员：美情报界应坚持情报公开以赢得信息战

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4月6日登载前中情局官员肯特·哈灵顿（Kent Harrington）的文章称，在日益重要的信息战中，美国情报界应担负起揭穿虚假信息的责任，将情报公开纳入考虑，协助判断开源信息的价值。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情报界一直在进行信息解密和分析，以预测俄罗斯的军事准备和意图。此间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发出了俄罗斯军事集结的警告，世界其他地区得益于美国全面的战略情报披露。

长期以来，美国情报界一直将公开机密信息视为大忌。信息

披露不仅可能威胁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信息收集和处理系统，还可能威胁到潜伏在敌对国家内部的情报人员的生命。然而，乌克兰战争表明，情报界应该重新调整关于公开机密信息的风险评估。在当今的媒体环境中，揭穿虚假信息的必要性与日俱增，这需要情报部门加以应对。

尽管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遭遇失败，但莫斯科并没有放松信息战攻势。乌克兰战争的前景如何仍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验证实地事实的公共情报对于决策者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参与破坏普京战前宣传攻势的情报分析师们应该继续充分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工具，在不透露来源、方法的情况下，公开机密信息。毕竟，情报分析可以而且经常利用来自商业卫星、公民记者、激进派分析家、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的开源信息。当然，情报官员和政府在使用开源信息时应该始终保持谨慎。情报机构还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来帮助验证第三方说法。这样，情报部门自己的分析能够有助于在日益重要的信息战中区分真假。

前外交官：美印应建立可持续且有效的战略伙伴关系

近日，《国会山报》(The Hill) 网站登载前美国外交官员肯尼斯·布里尔 (Kenneth C. Brill) 的文章称，当前美印关系呈降温趋势，双方应采取行动共建可持续且有效的中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

几十年来的中美印双边关系形势大于实质。美国希望印度完全倒向西方，但从反殖民斗争中脱颖而出的印度领导人更愿意制定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虽然印度的不结盟运动以及其与俄罗斯的军事交易往来给中美印关系设定了上限，但在美国民众对于印度普遍积极的看法、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以及地区外部威胁三重因素

影响下，美印关系之前的发展总体向好。然而目前，美印关系正陷入危险境地。原因有二：一是俄乌冲突。尽管美印有着“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但印度拒绝公开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为，并且正积极与俄罗斯达成相关石油协议。这表明印度和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交易性的，并非基于核心战略利益或价值观。印度擅长空谈战略伙伴关系，不会为此采取实质性举措。

二是由印度政府主导的对民主制度、进程和传统的破坏严重威胁到美印关系的根本。虽然印度的反民主事态发展尚未反映在美国政府声明中，但若继续发展下去，美印双边关系的可靠基础会被动摇。讽刺的是，这可能导致美印关系变得更像美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美国民众支持。美印关系的下降趋势对两国都不利，双方急需采取行动来防止关系的加速恶化。

对印度而言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即其国际影响力更多源于其过去的民主成功，而非来自尚未实现的成为经济和安全领域强国的潜力。莫迪不该以牺牲印度民主为代价追求短期国内政治利益，应该寻求印度的长期经济和战略利益。莫迪还应该加快印度军事供应安排的多样化。就美国而言，它需要认识到印度的军事、预算、地理位置、公众态度、发展目标和威胁认知与美国其他的伙伴相比是不同的。因此，美国需要谨慎地调整其行动和期望，与印度建立有意义的战略关系。要建立可持续的美印战略伙伴关系需要更现实且坦率的看待双方对伙伴关系的期望以及能够为此做出的贡献。

美专家：美国应增加国防开支以匹配其外交战略

战略与现实相一致应该是国防规划过程自始至终的重点。美

国需要扩大美军规模，才能与华盛顿现有的外交主张相匹配。虽然防务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但增加国防开支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险政策，因为它能确保美国具有保护自己、盟友和国家利益的能力。

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4月5日登载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科里·沙克(Kori Schake)的文章称，美国应尽快解决国防赤字问题，确保国防部的预算规模与战略目标相匹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安全威胁，美国必须大幅增加国防支出，而拜登政府的支出提议远未达标。政策制定者弥补这一支出缺口所用的时间越长，美国在缺乏赢得战争所需力量的情况下行动的风险就越大，独裁者也越可能利用美国的这种不足。正如俄乌冲突表明的那样，战争本身——而非演习或训练——才是衡量军事能力的真正标准。为了保证在战场上取胜，美国必须确保其能力远超对手。此外，美国还必须确保其战略与其愿意用于国防的资源相匹配。自老布什政府时期始，美国不断削弱军事预算和武装力量，这与其不断膨胀的扩张型外交战略之间产生了巨大分野，直到特朗普时期也无法填补这一鸿沟。

拜登上台后，尽管实现战略目标所需的军事资源与实际用于国防的资源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其政府似乎仍不打算限制美国的战略目标。俄乌冲突爆发后，政策制定者声称无需改变现有战略，国防部希望通过所谓的“综合威慑”战略来解决俄罗斯问题，认为该战略将通过巧妙编排利用所有层面的国家力量来减少对军事力量的需求。但是，在现实中，这一概念将国防部的战略建立在其无法控制的力量之上，并且不能取代资金充足的军队。俄乌冲突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国家安全态势，也改变了其需要的防

御态势。一份将俄罗斯在欧洲的军事行为纳入考虑，而非仅仅针对中国的战略，将需要更多的部队和不同种类的武器。优先解决国防赤字问题或许是一个好的开始。

在美国采取行动应对中国之前，恢复美国海军实力应该是另一个优先事项。政策制定者应该着手支持国防部的“500 艘海军军舰”计划，并开始发展建设海军所需的工业基础。投资造船不仅能在国内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概念提供急需的实质内容，还能扩充国防工业基础。

总而言之，战略与现实相一致应该是国防规划过程自始至终的重点。美国需要扩大美军规模，才能与华盛顿现有的外交主张相匹配。虽然防务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但增加国防开支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险政策，因为它能确保美国具有保护自己、盟友和国家利益的能力。

美国政治/其他

美学者：民主党需警惕左倾政策

美国《真清晰政治》(Real Clear Politics)网站近日登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卫·布拉迪(David Brady)等人的文章称，虽然民主党内进步派人士认为拜登的经济政策仍需左倾，但过往经验表明采取左倾政策需谨慎。文章摘要如下：

近期，拜登总统在 COVID 救济法案以及气候变化立法等问题上面临着来自其党内进步派的压力，认为其经济刺激提案过于保守，很可能重蹈克林顿与奥巴马的覆辙。然而，在克林顿与奥巴马执政期间，国会中期选举的失利并非因为政策过于保守，反而

是因为在某些问题上走得太远。例如，克林顿任期内的枪支管制、就业立法以及医疗保险等政策过于激进，改革的失败导致了选民的流失。奥巴马执政期间也遭遇了类似的失败。奥巴马任期内推动通过了一项经济刺激法案和《平价医疗法案》。然而，过于激进的改革使得民主党人再一次流失选民。综上，太过自由的政策将可能会让民主党人付出代价。

近期在国会通过的 1.9 万亿 COVID 救济方案存在被认定为过度自由的风险，需要警惕。虽然该法案目前的群众口碑良好，但鉴于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222-212），他们需要谨慎权衡个中利弊。

《政客》：民主党中期选举亟待年轻选民支持

美国《政客》(Politico) 杂志网站 4 月 10 日刊载了其资深记者埃琳娜·施奈德 (Elena Schneider) 的分析文章，认为当前拜登在年轻选民中支持率低迷，应对中期选举，民主党急需采取行动，以获得青年人的支持。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18、2020 年选举中，18-30 岁年轻人的高投票率助力民主党获胜，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选民的选票已被民主党锁定。近期民调显示，拜登在 18-30 岁人群中的支持率降到了几十年来民主党总统的最低点。在盖洛普的调查中，奥巴马在该群体中的支持率从未低于 42%，而拜登的支持率总体在 20%-30% 之间徘徊。

当前民主党的中期选情恶化，国会优势微弱，年轻选民的疏离成为了 2022 年民主党人面临的现实威胁。以往选举中民主党人主要担心年轻人的投票率问题，而在经济动荡、虚假信息膨胀以及没有前总统特朗普作为衬托的背景下，民主党人更需要通过说服和动员以获得他们的支持。

通过对美国年轻选民,尤其是 Z 世代人(出生于 1997 到 2012 年间)的纵向观察,不被倾听是年轻人政治态度淡漠的症结所在。没有人愿意倾听年轻人的意见逐渐形成了,年轻人不参与投票-候选人忽视该群体-年轻人继而不参与投票的恶性循环。对此,民主党应加强同年轻人的沟通,并在年轻人关注的领域上(如学生债务、心理健康、气候变化等)积极采取措施。2020 年大选初选时,拜登也曾在年轻选民中处于劣势,但当他认真倾听年轻人意见、推动年轻人关心的议程后,局势得以扭转。这一经验可能为年轻人缺乏参与感和投票动力的当下提供一些经验支持。

拜登政府基建法案的 5 个潜在政策漏洞

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4月7日登载该组织政策分析师大卫·迪奇(David Ditch)的文章称,拜登政府基础设施法案实施过程中的一系列潜在漏洞将对美国卡车司机等工人群体带来巨大负担。文章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天然气价格因生产受限而上涨。美国国内能源行业的激进分子试图通过“延期”和“暂停”来阻止美国大片领土上的能源生产,此举向全球能源市场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即美国不会增加供应。这增加了全球市场对能源稀缺性的预期,也意味着驾驶员可能会继续承受高昂的油价。

第二,虚假的“高速公路”支出。高速公路支出通常会让人联想到增加车道以及修复破损路面等。然而,尽管美国高速公路投资数额屡创新高,但资金实际上被挪用到了其他项目上。其中包括由左翼支持,极不切实际的车道减少计划,以及与高速公路完全不相关的猪肉支出项目以及远离高速公路系统的“街道景观改善”、“有轨电车”项目等。

第三，基础设施法案加大了对已没落的铁路项目和公共交通的投资。美国人惯常的出行方式中，公共交通和铁路加起来不到总量的五分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公交客流量更是大幅下降。将数十亿美元用于改善公共交通设施和扩建城际铁路，无疑是一种浪费。

第四，权力争夺牵涉其中。基础设施法案通过后，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帝吉格（Pete Buttigieg）监督制定了一份关于项目如何获得新资金资格的“指导备忘录”。备忘录的内容暗示各州，扩大公路容量的项目应该排在最后，这与基础设施法案的原则相悖。该备忘录遭到了共和党的坚决抵制。

第五，给予劳动力的恩惠有失公允。对大工会（Big Labor）而言，一个隐藏的福利是公共交通的资金支持。公共交通工人加入工会后，绝大多数在左倾地区工作，这部分地区的公职人员多为左翼，因此他们获得不平衡和过多的补偿不足为奇。在交通上投入更多资金将意味着工资和福利将比以往更快地增长。基础设施法案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填补工会，这降低了税收的价值。

民调网站 538：重划选区损害有色人种的代表性

近日，美国民调网站 538（FiveThirtyEight）登载该站高级选举分析师纳撒尼尔·拉齐（Nathaniel Rakich）的文章称，2022 年国会选区地图在有色人种群体代表性层面存在不足。文章主要论证如下：

从理论上说，根据《投票权法案》（the Voting Rights Act），每个种族群体都必须有平等的机会选举他们心仪的候选人。这意味着在重划选区时要尽可能多的规划出非白人选民占主导地位的选区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然而保守派对这一解释发起了围攻，

认定其违宪。更为复杂的是，对于一个地区的多样性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选出受少数族裔支持的候选人并没有统一标准。因此在实践中，各州最终划分出的非白人占多数的选区往往比预想的要少，最新的选区划分情况揭示了这一问题。一方面，非白人美国人——即拉丁美洲人——确实在某些州获得了影响力，但在其他州却失去了影响力。拉美裔的席位增长主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在伊利诺伊州等其他地区，拉美裔人口被低估，没有获得足够的代表权。另一方面，也有几个选区的非白人——尤其是黑人——选举候选人的能力受到了削弱，这主要由黑人后代人口分散导致。

有色人种不仅没有获得被剥夺的选举席位的控制权，也没有因人口红利获得更多席位。例如，2010年至2020年，德克萨斯州（Texas）人口增加了400万人，该州新增两个国会选区。德州人口净增长的95%归功于有色人种，但少数族裔占多数的选区却没有增加。更重要的是，仅拉美裔就占该州净增长人口的近半数，但拉美裔占多数的选区反而减少了1个。

除此之外，在南方，黑人在众议院的代表权长期不足，他们的处境在新一轮选区重划中并没有得到改善。例如，阿拉巴马州（Alabama）通过的一份新国会选区地图与旧地图一样，有六个白人占多数的席位，只有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席位。民权者对此提起诉讼，称《投票权法案》要求该州拥有两个黑人选区。但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该地图不能被推翻。

近来，美国最高法院在保守派的推动下表现出推动法律界限的意愿，这可能改变最高法院对《投票权法案》的历史解释。此举可能会削弱该法案对少数族裔地区的保护，由此产生的影响对有色人种而言，可能比不给他们代表权更糟糕。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